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与分布

李木洲，刘海峰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是中国官方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内因与政治、战争、经济等客观存在的压力外因二者合力推动的历史产物。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在各省份的具体分布上基本呈现为“扁平化结构分布格局”，即大部分省份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反观当今基本呈现为“金字塔结构分布格局”的部属高校，其启示有三：一应加强政府引导，调整教育布局战略规划，二应依托经济振兴计划，加大中西部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三应实行发达援助落后的对口帮扶策略，以促进当代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化。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区域分布；教育均衡

【作者简介】李木洲（1981—），男，湖北广水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考试制度、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刘海峰（1959—），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考试制度与科举学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146）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4月第35卷第4期

国立大学意为“国家设立的大学”，即由中央政府教育部门设立并直接管辖、校长由中央政府或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任命、经费来自国库、冠以国立之名称的公立大学。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的国立大学往往是该国最高水平的大学。中国只在民国时期设立过国立大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大学一律去掉“国立”二字，从此中国大陆地区不再存在以“国立”冠名的大学。不过，梳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与分布，对于我们今天均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合理布局教育部直属高校仍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次第

中国的“大学”自古就以官办为主，不管是汉代的太学，还是唐代及其后的国

子监等。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中国虽先后出现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及国立大学等多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依然是中国大学的主体与主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代国立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起始、快速增长、过渡探索、整顿规范、内迁、整顿恢复等六个阶段，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国立化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它既是对中国办学历史传统的一种自然继承，又是民国时期教育兴国思想的具体体现。综观民国时期大学的国立化历程，其基本与民国国祚相伴始终，且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国立化，二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国立化。

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初建，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成国民之志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同年9月，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宣布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教育宗旨，代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与规程，重新修订学制，建立新的学校系统，是为“壬子癸丑学制”。至1922年“壬戌学制”和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等的颁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基本完成了从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的转变。此阶段虽经历了封建主义教育的复辟活动，但高等教育仍有较大发展，不仅大学的数量与规模有所扩大，层次有所丰富，而且大学的类型也得到多元化发展，大批的旧式学校、学院及学堂被改造为各类大学。其中，创建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及三江师范学堂先后被民国教育部接收改造为国立

北京大学（1912年）、国立北洋大学（1913年）、国立山西大学（1918年）与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批“国立大学”。此外，北洋政府统治晚期，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广东法科大学、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还合并成立了国立广东大学。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从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此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局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统治

前期，即“黄金十年”（1927—1937年）；二是抗日救亡及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即1938—1949年的国家动荡期。在“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为加强

对高等教育的控制，颁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修正大学令》、《大学组织法》、《学位授予法》等一系列教育法规，不仅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

还利用收回教育权运动加快了国立大学的设立速度，期间增加了9所国立大学，仅1927年就先后设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6所国立大学，1928年增设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增设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又增设国立四川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又陷入外患内忧的动荡期，尤其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的疯狂破坏，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国民事业遭受重创。但在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此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进程不仅没有受阻，反而在逆境中得到长足发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由于办学经费紧张而顺势改为国立，如省立广西大学、省立安徽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厦门大学等先后改为国立大学。二是战时被迫内迁的数所大学联合或合并办学成立临时国立大学，如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联合组成，后再迁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联合办学，后再迁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此类大学大都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分立或解散复原。三是因政治时局之需新设或接收改造国立大学，如国立中正大学（1940年）、国立英士大学（1943年）、国立台湾大学（1945年）、国立政治大学（

1946年）和国立长春大学（1946年）等。

纵观民国时期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既有中国官方办学历史传统的文化内因，又有政治、战争、经济等客观存在的压力外因，是二者合力推动的历史产物。具体而言，其设立次第大致如表 1 所示：

表 1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次第

设立时期	学校名称	国立化时间	所在城市	原校及其隶属等情况	备注
北洋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	1912 年 5 月	北京	北京大学校(原大学堂), 直属教育部	
	国立北洋大学	1913 年	天津	北洋大学校(北洋大学堂), 直属教育部	
	国立山西大学	1918 年 7 月	太原	山西大学校(山西大学堂), 直属教育部	
	国立东南大学	1921 年 8 月	南京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三江师范学堂), 公立	
	国立广东大学	1924 年 11 月	广州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首立广东法科大学, 首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	1926 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国民政府时期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7 年 3 月	南京	国立东南大学, 河海工科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 江苏法政大学, 江苏医科大学以及江苏境内两所公立专门学校共 5 所公立合并	1928 年先后更名为国立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劳动大学	1927 年 5 月	上海	新创办大学(1931 年裁撤)	
	国立同济大学	1927 年 8 月	上海	同济医工大学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7 年 8 月	杭州	求是书院, 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院校合并	1928 年 7 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
	国立暨南大学	1927 年 9 月	上海	国立暨南学校(暨南学堂)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1927 年 11 月	武汉	国立武昌大学, 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湖北省立医科大学, 湖北省立法科大学, 湖北省立文科大学, 私立中华大学等合并	1927 年 12 日解散, 1928 年恢复成立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	1928 年	北京	清华学校(清华学堂)	
	国立青岛大学	1930 年 4 月	青岛	国立山东大学, 私立青岛大学合并	1933 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	1931 年	成都	国立成都大学, 国立成都师大, 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	1934 年正式享受国立大学经费待遇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931 年 7 月	北京	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	
	国立东北大学	1932 年 1 月	开封	国立东北大学(南迁)	
	国立湖南大学	1932 年 7 月	长沙	国立湖南大学	
	国立厦门大学	1932 年 7 月	厦门	私立厦门大学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 年 8 月	长沙	国立清华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迁长沙联合办学	1938 年西迁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 年三校回迁原址复校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7 年 8 月	西安	北平大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国立北平工学院三校迁西安联合办学	1938 年 4 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9 年 8 月又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

国民政府时期	国立云南大学	1938年7月	昆明	省立云南大学(东南大学)	
	国立交通大学	1938年	贵州	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北平分校联合(南洋公学)	
	国立广西大学	1938年	桂林	省立广西大学	
	国立中正大学	1939年3月	南昌	新创办大学(1943年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	
	国立复旦大学	1942年1月	重庆	私立复旦大学(复旦大学,1943年迁上海)	
	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1942年1月	开封	省立河南大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国立贵州大学	1942年1月	贵阳	国立贵州农工学院(贵州大学堂)	
	国立重庆大学	1943年	重庆	四川省立大学	
	国立英士大学	1943年1月	杭州	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省立浙江战时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	1945年	台北	台北帝国大学(日据时期)	
	国立安徽大学	1946年	安庆	省立安徽大学	
	国立兰州大学	1946年	兰州	国立甘肃学院改建(甘肃政法学堂)	
	国立政治大学	1946年	南京	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	
	国立南开大学	1946年10月	天津	私立南开大学	
	国立长春大学	1946年10月	长春	伪满洲国高校改建(1948年解散)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中正书局”1957年出版;李元忠,《晚清民国大学之变迁》,中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李洪岩等编著,《大学史论》,天津出版社2010年出版。

由上表可见,民国时期国立大学设立的时间相对集中,1927年设立了6所,另外,抗战时期及抗战复员阶段设立的国立大学特别多。

二、国立大学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民国时期全国最多共设过国立大学32所(见表2),其中北京3所,上海4所,江苏、天津、浙江各2所,吉林、辽宁、湖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重庆、安徽、山东、河南、贵州、甘肃、福建、云南、台湾各1所。

由表2可见,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在总量上虽然不多,但在各省份的具体分布上基本呈现为“扁平化结构分布格局”,即大部分省份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如云南有云南大学,河南有河南大学,山西有山西大学,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与民国政府较为注重大学区域分布是分不开的。有研究指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的创建多以自发状态进行,主要密集分布在现代工商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权威的加强,政府给予了教育更多的关注。如1931—1932年,国民政府邀请国际联盟教育专家考察团来华调查中国教育发展情况,考察团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区域布局不均衡的问题。针对这一状况,国民政府教

育部采取了重新改组与合并大学的方式，对大学区域分布进行了合理化与均衡化调整。但遗憾的是，随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相继爆发，民国时期所设的国立大学在动荡中大多并未按照最初的规划得到良好发展。不过，从长远看，它们为后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表 2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分布情况

省市	国立大学	数量	省市	国立大学	数量	省市	国立大学	数量
北京	北京大学	3	浙江	英士大学	2	天津	北洋大学	2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南开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广西	广西大学	1	陕西	西北大学	1
上海	复旦大学	4	广东	中山大学	1	四川	四川大学	1
	同济大学		湖南	湖南大学	1	河南	河南大学	1
	交通大学		江西	中正大学	1	贵州	贵州大学	1
	暨南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1	甘肃	兰州大学	1
江苏	中央大学	2	安徽	安徽大学	1	福建	厦门大学	1
	政治大学		山东	山东大学	1	辽宁	东北大学	1
吉林	长春大学	1	云南	云南大学	1	台湾	台湾大学	1
湖北	武汉大学	1	山西	山西大学	1			

注：1. 1949 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前，全国共设 35 个省，12 个院辖市，1 个特别行政区（海南），1 个地方（西藏，不含蒙古地方）。2.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如东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中原大学等著名大学均未列入。3. 此处统计的 32 所国立大学未包含表 1 中列出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追根溯源，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之所以分布较为均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 迁都因素。自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在南京成为民国第一个临时政府所在地后，民国时期首都随着民国政府的变易而迁移，先后历经了北京、广州、武汉、南昌、北平、沦陷前的南京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和抗战胜利后的还都南京的曲折历程”。由于国都作为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特殊，尽管频繁地迁移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但在迁移过程中，却无形打破了中央集权对中央政府所在地教育资源的集聚性分配，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范围，对均衡区域教育资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纵观民国政府变迁，首都从北京迁至南京，既不在以往的首善之区北京，也不在当时经济最发达、大学最多的上海。首都不是在一个地方长期固定，对中央集权制国家来说，减少了国立大学高度集中的可能性。

2. 抗战因素。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各地，尤其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卢沟桥事变”以后，随着京、津、沪、宁相继陷落，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处于战区之中和临近战

区的高等学校，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境地。为谋求国家人才培养之赓续、民族文化之薪传，大学内迁成为必需之举，从而形成“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广西、湘西、湘南、粤西、粤北为中心的中南地区南部山区，以赣中、赣南、浙西、浙南、闽中、闽西等为中心的华东南部丘陵地区，以陕南、关中、陇东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内迁集中地带。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多次数的大学内迁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内陆地区长期以来的高等教育资源落后状况，带动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均衡化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规划内迁大学复员过程中，非常重视改变原有大学在区域上的不合理分布，提出：“复员决不是简单地复原，对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及其院系科别之增减，必须先有通盘计划，方足谋日后至合理发展。”而主持战后大学复员工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开会致词》中亦明确强调：“我们究应如何趁各级学校复员时机，在地域上作一相当合理的分布，使全国教育得到平衡的发展。”据统计，抗战时期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10所，抗战胜利当年和次年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6所。

3. 政策因素。民国政府实行大学均衡化的高等教育政策，也是导致国立大学分布比较合理的重要因素。早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即有通盘考虑均衡划分全国高等教育区域的意图。如袁世凯颁布的《教育纲要》，拟分全国为四个大学区域。汤化龙任教育总长时，也试图在全国划分北京、南京、广州、济南、成都、福州六大学区。范源濂任总长时，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覆盖21个省份的七大学区。只可惜皆因政局频繁变动，掌管人员不能久于其位，而只停留在计划层面，未曾实行。至国民政府前期，由于政局稍稳，国民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均衡高等教育资源的措施，如邀请国际联盟派教育专家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分布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蔡元培的推动下，自1927年起实施了为期两年的大学区制试验，尽管大学区制试验因削弱了地方办学自主权，而不得不在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中戛然而止，但大学区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地方办学的权利意识，使其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办大学的行列中，最终促进了区域高等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三、启示与借鉴

若以办学管理模式及经费来源为参照，当前大陆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可类比于民

国时期的国立大学。然而，其分布极不均衡，基本呈“金字塔结构分布格局”，表现出强烈的两极分化态势，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尤其是首都北京，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则相当匮乏，大多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甚至有近42%的中西部省区没有“高水平大学”（主要指教育部直属高校），这种情形类似民国初期或抗战前期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显然，这种非均衡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状态，在事实上严重影响着“高考资源”的分配，以及国家人力资源结构的平衡。从长远考虑，要实现我国教育公平与高考公平，特别是国家中西部崛起战略，必须逐步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综观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次第与地理分布及其原因，对合理调整我国当前以部属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不无启示与借鉴意义。

其一，加强政府引导，调整教育布局战略规划。有研究指出，民国时期“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优于中部地区更多地是由于政府政策导向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出于建设边疆和促进东西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国民政府制定了‘积极建设西安、成都、昆明、兰州四地之教育机构，俾五年内，得树立为西南西北之文化中心据点’的计划，采取多种鼓励性措施，通过政策导向努力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均衡教育部直属高校是一个值得重点考虑的问题。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为缓解目前区域间的高考竞争压力，减轻招生属地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进程，保障教育公平与高考公平，我们曾建议将部属高校分布至所有省区，即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区，选择一所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学，划归教育部直管，享受部属高校同等待遇，以逐步改善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状态。采取政府引导与政策倾斜的方式，为中西部增设重点大学或提升已有较好基础的大学的办学质量，将从整体上优化我国东、中、西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结构。

其二，依托经济振兴计划，加大中西部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经济是教育的命脉。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的薄弱不外是经济落后的具体表象之一。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历史背景下，依托经济振兴计划，加大中

西部高等教育投入力度，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非均衡化的必要路径。所幸的是，2013年2月20日，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制定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其中在优化院校布局结构方面，强调“优化中西部地区院校设置工作”。至

5月22日正式向社会公布的时候，该计划增加了以下内容：“扩大优质资源：重点支持14所地方高水平大学。为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振兴计划将启动实施支持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在‘十二五’期间，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支持每个省份建设1所地方高水平大学。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对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给予大力支持。有关部门将比照直属高校，从人才队伍建设、招生计划、学位授予、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相关省份将把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予以重点建设。”这个“一省一校”政策，正契合了我们的建议。

其三，实行发达援助落后的对口帮扶策略。这是民国后期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又一重要经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组织内迁高校回原地复员过程中，为借机调整高校的不合理分布，曾计划将战前大学最集中的北京、上海两地的部分内迁高校留设原地或改迁他地。如1938年4月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内迁陕西后合组的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后虽分立，但西北联大的子体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五校”。西北联大是中国高等学校布局由沿海向西北扩展的重要环节和载体，是20世纪50年代高校西迁的先导，是当今西部大开发的文化、教育和历史资源之一。西南联大复员后，原联大师范学院留昆明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教育部任命已受聘南开教育系教授的查良钊任院长，北大教授罗庸、谭锡畴，清华教授杨武之、胡毅，南开教授蔡维藩、蒋硕民等，自愿请假留在昆明担任教学及行政职务。此外，西南联大常委还通过《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作办法》，由梅贻琦、傅斯年、张伯苓具函，将西南联大校舍、校产、图书资料等有关资料清册，移交昆明师范学院。无疑，通过“遗、留、帮、带”等举措，不仅避免了西南、西

北等地复归荒凉寂寞，还保存了一定的教学科研实力，为后期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东、中、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的情形下，考虑采取优势区域反哺劣势区域，先进大学帮扶落后大学的策略不失为一种良善的选择，同时，还可提升区域协同合作，以及加强大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总之，无论是因为客观现实逼使，还是政府主观上的指导思想所导致，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分布是相当均衡的，相较于当今教育部直属高校高度集中于首都和沿海省市更是如此。尽管民国时代已经远去，但其探索中国大学发展的宝贵经验，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今天我们要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合理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与分布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参考文献：

- [1] 肖卫兵. 近代国立大学发展分析 [J] . 教育评论, 2 0 1 2 , (1) : 1 3 5 .
- [2] 《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 [G] / / 辛亥革命资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 9 6 1 : 2 .
- [3] 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M]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 9 9 3 : 3 6 8 .
- [4]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 [G]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9 6 1 : 2 2 6 .
- [5] 高奇. 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 [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9 9 2 : 2 4 1 .
- [6] [1 3] 宋争辉.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非均衡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思考 [J] . 高等教育研究, 2 0 1 2 , (5) : 2 3 , 2 7 .
- [7] 刘振修. 民国时期都城的变迁 [J] . 文史天地, 2 0 1 0 , (7) : 3 8 - 3 .
- [8] 余子侠.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J] . 近代史研究, 1 9 9 5 , (

6) : 167.

[9] 徐国利.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 [J]. 天津师大学报, 1996, (1): 5.

[10] [11]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 [M]. 王聿均, 孙斌, 编.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7: 190, 179.

[12]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 (下)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645.

[14] 刘海峰, 李木洲. 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12): 17-25.

[15] 高靓.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公布 重点支持14所地方高水平大学 [N]. 中国教育报, 2013-05-23.

[16] 刘海峰. 历史需要诉说: 西北联大的命运与意义 [M].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9): 87.

[17]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302-303.